

## 捷克當代文學的集體記憶—克里瑪、赫拉巴爾及昆德拉

莊惠涵、鄭得興

尼采的著作《偶像的黃昏》內提及藝術是苦難者的救星(Nietzsche, 1996 : 195)。他認為創作藝術能救贖空虛和充滿苦痛的人生，藝術是讓人活下去的能量。文學作品的創造可以救贖苦難的人生，因此文學作品具有深刻的虛無痛苦體驗和美學的價值。(張美娟, 2011 : 159-162)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寫道一切作品之中，我只愛以自己的心血寫成者，那心血便是精神。(Nietzsche, 1992 : 79)痛苦是孕育文學的土壤，捷克作家經歷政治帶來的種種痛楚後，方能用血淚寫出讓人顫抖、痛苦的文學作品，這是生命經歷的對話，如赫拉巴爾用戲謔的文筆帶出難以消化的傷痛。文學是生命的反應，它反映生活中的困難，筆者希望從捷克當代作家的著作中觀看捷克面對各種社會狀況時如何反應，筆者認為在文學作品中的愛情故事不只是愛情故事，它可以展示生命的荒誕，表相的背後可以述說人面對生命中種種歷程的回應。

捷克在 1948 年 2 月的民主選舉結果，共產政權成為民主政治的無奈與諷刺，歷經 41 年極權統治的社會生活，人們有說不完的人生故事。捷克當代最有名的三位小說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博胡米爾·赫拉巴

爾(Bohumil Hrabal)及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他們的小說道出自己的過往，也成了捷克社會的集體記憶。捷克人透過他們的小說定格社會的過去(the past)，也控訴過去種種的荒謬。捷克當代小說滿載著共產世界的符碼，要了解這段過往，捷克這三位小說家的作品是最佳範本。

### 伊凡·克里瑪

伊凡·克里瑪 1931 在布拉格的猶太人家庭出生，因為身為猶太人，十歲時跟隨雙親被送往納粹集中營，直到 1945 年奇蹟般地倖存下來，他真正經歷過歷史上的關鍵時刻，但他不像其他作家選擇逃離捷克，如昆德拉移居到法國，因為對於捷克有深厚的情感，至今克里瑪仍定居在布拉格。

不論是遠離祖國的昆德拉還是留在家園生活並書寫異議的伊凡·克里瑪，共產主義制度下的生活為捷克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靈感。現在舊政權已不復存在，昆德拉正在轉向廣泛的主題，拋棄母語轉而講法語，而伊凡·克里瑪現在也許是在他的祖國生活寫作且具有國際上最知名捷克作家身分之人。伊凡·克里瑪預測捷克的動盪過去後，人們

生活一定充滿了不確定性。他的小說角色嘗試處理他們的個人問題，因此在書中呈現壞運氣、空虛、在黑暗中摸索等感受。(B. R. Bradbrook, 1988 : 656)社會脈動常來自政治制度，面對國家社會極權主義下被扭曲的生活困境，捷克人如何反應是永恆的命題，有些作家留在當地尋找希望的火炬，寫作文章形成地下文學，成為國家眼中的異議份子。有些小說具有社會思考和關懷，文學展現痛苦。

克里瑪的愛情故事都被設置在特定時代的政治大背景中，人物在婚姻生活與婚外情之間遊走，情欲與情人在小說中具有比道德選擇更大的意義，情人的出現使改變生活軌跡勢在必然。(喬華，2006 : 3-19)在小說中的情愛故事中可以讀出現實的辛酸與背後的荒誕。(張洋, 2014 : 30)愛情是描寫生活的載體，伊凡·克里瑪用情愛去表現現實，書中的愛情不是真正的愛情，只是一種逃避的方法，像一齣荒謬劇，情欲是壓力釋放的出口，它是生活的體現。

克里瑪的小說人物具有邊緣性，多為異議分子，他們被排斥在主流社會外，時刻受到監視。(喬華，2006 : 3)小說呈現壓迫滲透到生活中的各個層面。(Kunes, 1994 : 848)伊凡·克里瑪的著作表現了人們在充斥著謠言的社會中的恐懼感，人民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皆遭剝奪，在被控制的環境中，他們不能正常的交往，無法相信枕邊人，人與人之

間充斥的謠言和背叛，家庭生活中夫妻互相欺騙對方，完美的婚姻似乎不存在。

《法官》的回顧性敘述讓少年阿丹姆的懵懂無知與成年法官的洞察秋毫形成鮮明對比，戲謔調侃構成強烈的反差。兩重敘事的悖離形成作品張力，同時也使讀者看到了捷克作家特有的幽默方式。克里瑪的小說有反諷的味道，用幽默來描述殘酷，讓人有可笑的感覺，但是又笑不出來。而用喜劇形式表現出來的悲劇，往往比悲劇本身擁有更震撼人心的力量。(喬華，2006 : 11-17)

《愛情與垃圾》中多處提到神奇又可笑的傑爾克斯基語，在南極應用於人和非洲猿猴之間的溝通。此處的幽默不是使讀者捧腹大笑的喜劇，而是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無奈與反諷，是面對荒誕世界的苦笑與自嘲。克里瑪將悲劇化為幽默，用平淡的口吻敘述並不平常，甚至讓人憤怒的事件，並且不表露主觀態度。他用喜劇的方式表現悲劇，取得比悲劇更深厚的意蘊。(張洋，2014 : 30)克里瑪用反諷的手法來描述荒誕生活，將一幕幕荒誕劇呈現在讀者眼前，他用自嘲、幽默且堅忍的人生態度來對抗生活的沉重和荒誕。

只要熬過來，不幸的經歷總是值得的。

《我快樂的早晨》是一部面對生活的荒誕而顯得輕鬆快樂的作品。(景黎明、景凱旋，2002 : 1)克里瑪的小說展現納粹和蘇聯政權下捷克人民生活的日常，且主角多為小人物。

人們可以從文學看捷克人怎麼面對生活的荒謬。

布拉格被捲入大國之間的霸權爭奪時捷克人選擇暫時順從。這是一種消極而又深刻的理性。面對太過強大的力量，迎面而上只會玉石俱焚，而適當忍讓和退縮，雖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卻保存生命和希望。(張洋，2014：30)捷克面對入侵選擇投降，避免敵軍的攻擊，人命和建築得以存留，因此保留下美麗的文化遺產布拉格，不像其它國家受到許多摧殘，如波蘭首都許多的建築被炸毀而需重建，而那些重建後的建築並不等同於消逝之物。

伊凡·克里瑪離開集中營後作為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他選擇用寫作來抵抗遺忘，記錄過往，克里瑪認為記憶並不僅僅通過對某一種特定經驗的如實報導來體現，它是一種責任。他將那些已逝者的聲音傳達，在文字的流轉中留住歷史的記憶。(張洋，2014：29)伊凡·克里瑪擷取一些個人的生活經驗融入小說中，帶有一些自傳的性質，又包含在捷克社會的集體記憶中，與捷克社會歷史連結的文學傳達出捷克的民族性。

伊凡·克里瑪著作傳達一種對國土的歸屬與認同，但也展現他筆下主人翁之間的疏離。伊凡·克里瑪甚至藉由散文文體的自由和鋪敘，讓作品可以更深入且詳盡地呈現個人和社會的關係，與現實有了更緊密的貼合。克里瑪著作中的回憶與捷克發生的歷史事件

有深刻的連結，他的作品以幽默和反諷的方式述說極權時代下的愛情故事和兩性關係，表現了個人生活與情感的痛楚，在一個思想、行動被嚴密監控的社會中，面對不合情理的混亂，人們有甚麼舉動，順從下的反抗是如何展現的。

###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這位捷克作家，生於1914年，1968年「布拉格之春」共黨政權強硬派重新掌控捷克斯洛伐克後，赫拉巴爾由於抗議共黨的行為而被列入禁止出書名單，成為被嚴密監視的作家，他還因此隱居到布拉格城外的小鎮。(李舫，2014：80；蔣承俊，1997：33)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經歷納粹和共黨統治，他的文學生命被政治影響。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筆下的人物說出的話被理智的人認為不合情理，做出的事是體面人不會去做的。這些人物生活在底層，他們珍珠般明亮的心地閃爍的是豪放開朗詼諧風趣的色彩。他的人物正如他自己一樣，都在現實的矛盾當中，抒發出一種昂揚樂觀的健康基調，布拉格式的反諷與幽默展示的世界與現實形成的強烈反差，映襯出這些人物的悲慘處境。(羅望子，1998：92)赫拉巴爾非常善於寫小人物，(邱華棟，2015：205)米蘭·昆德拉認為赫拉巴爾是非常優秀的作家。(Sternstein, 2008：625-626)赫拉巴爾喜歡的環境是旅店和酒吧，人們聚集於此不是為了飲

酒，而是為了睦鄰、團契和溝通。(B. H. Nosco, 1967 : 98-99)博胡米爾·赫拉巴爾是捷克的國民作家，是屬於捷克人民的心靈作家。他的作品無論形式還是寫作的手法，其獨有的幽默感和語調，都非常貼近平民。(邱華棟, 2015 : 206)赫拉巴爾在捷克家喻戶曉，他的文字具有捷克風味，多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

《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是以一個捷克餐廳服務員的視角，來呈現捷克在二十世紀幾十年間的命運，歐洲的戰爭和歷史風雲的變幻被呈現在讀者眼前。(邱華棟，2015：204-205)《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呈現當時的社會生活，主角是個天真的小人物，樂觀且接受這個世界，因此映照出真實社會變遷的殘酷。

赫拉巴爾是律師、文員、鐵路工人、電話運營商、旅遊銷售員、礦工和舞台手等。(B.

H. Nosco, 1967 : 98-99)赫拉巴爾先後做過許多不同的工作，他的作品大多描寫普通且默默無聞的人。他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來讓他們平凡又特別的人物形象躍然於紙上，因此赫拉巴爾的小說裡充滿捷克的氣味，他的作品展現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所發出的微弱光亮。《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愛情故事，但不是一般通俗小說般的愛情故事，是平靜但憂傷的獨白，是對暴行的控訴。

赫拉巴爾的小說以黑色幽默來表現荒謬的人生劇場，他將荒誕氣息帶入作品中，展現了捷克這個國家曲折的命運，納粹到共黨的政權移轉對人民的影響，小說述說的故事，

不只是那位小人物主角的故事，其實也是捷克這個國家的故事。閱讀他的作品中描述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可以感受到捷克人獨特的幽默精神，將悲劇化為幽默，帶著一些苦中作樂、阿 Q 的想法，面對荒誕的日子，用幽默以對，使黑色幽默在其中流淌，展現了捷克人的民族特性，那些使捷克人在那個特殊時代下生存下來的性格和轉變的面貌被「再現」。

### 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是捷克極權主義政治的受害者，被迫移居法國，曲折的生活經歷以及獨特的人生觀、審美觀和小說觀，使其小說及文藝隨筆都呈現出非常鮮明的特徵。(高翠君, 2007 : 4 -33)性是昆德拉小說中作為思考人生存狀態的載體(喬華，2006 : 25)，昆德拉的作品是關於「性與政治」，(P. Petro, 1982 : 45)他的作品以政治和性愛為獨特的切入點。以人的存在為深刻的探索主題，對生命存在的本色還原和思考，啟發著每個時代的讀者去反思自己的生存處境，而關於這些小說的文藝隨筆更是結合嚴密的邏輯思維、淵博的學識智慧和優美的文采於一身。(高翠君, 2007 : 4 )

昆德拉小說中的人物都生活在相當尷尬的境地：他們一般是生活在極權主義的陰影下，這種極權主義有著自己運行的荒誕邏輯，又具有毫無意義的強制性，它就是世間所有

一切的價值標準，人物的生活，尤其是那些知識份子的個人意義以及個人自由已經被這種極權剝奪殆盡。(高翠君，2007：16)

遺忘是昆德拉考察人與政治、時代、社會歷史關係的一個重要話題。在《無知》中，他通過描述將捷克民族的魅力展現了出來，這正是他眼中被拋棄的故土與美麗。在昆德拉的小說中，流亡他鄉的人，離開了家園，就如同浮萍一樣漂浮在異質的文化環境中，失去了往日的依託和歸屬。他認為人只能去留住他所經歷過的一小部分，而這些就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唐若冰，2008：127)人無法記得過往的種種細節，因此需要依靠文字留下那些記憶，人的情感是流動性的河流。

米蘭·昆德拉的幽默趨向了音樂的抽象和哲學的思辨(邱華棟，2015：204)，他的著作《玩笑》述說主人公一生一再陷入荒誕的玩笑中，因為心中的玩笑面臨被愛情、友誼背棄的悲劇性際遇，在心靈畫上一道道的傷痕，面對荒誕的人生，愛情和報復終究也是一個讓人笑不太出來的玩笑而已，以幽默的語調娓娓道出諷刺的人生歷程，歷史不也是如此像場諷刺的玩笑嗎？

## 小結

在歷史上小國捷克的命運曲折，迫使捷克不可避免的被捲入歷史洪流中，人們為了生存，內心裡有痛也要帶著眼淚微笑。流淚是因為為自己和民族命運而悲傷，笑則是應對

外部世界的辦法。這就是捷克所出產的獨特的文學美學，在幾位捷克作家那裡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捷克作家筆下的幽默是一種弱者的幽默感，帶有小國歷史命運的色彩，他們命運多舛卻精神不屈，捷克人的幽默帶有黑色幽默的底色，捷克出身的作家對人類的境遇、社會的境況和自我的境遇進行了深入探察，寫出了獨到的犀利的文學。(邱華棟，2015：203-205)

米蘭·昆德拉這一代捷克小說家被懷疑他們的經驗不真實，是由幻滅的感覺所孕育(P. Petro, 1982：44)，荒誕且不合情理、不合邏輯。(全秋菊，2005：9)上述這三位作家的作品內容，揭示了過去生活中的荒誕不堪。

三位作家都是捷克人，經歷過歷史的動盪，在社會主義強調美好未來的謠言下承受對人權的壓迫，他們同樣具有對社會生活的幽默，用愛情故事來展現人生的荒誕劇，但作家個性各有差異，著作展現不同的特色，運用不同寫作手法呈現真實面，把來自自己親自生活的痛苦融入小說中，三位作家的著作皆有沉重的歷史感，文學記錄在那個時代的社會下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能讓人感動且充滿希望的共產主義社會，一堆人為理念去做出殘忍的行為。

這三位捷克作家的文學作品是平靜的為弱勢族群發聲且帶有歷史集體記憶的著作，筆者希望探討歷史文化脈絡，文化對人思想、價值觀的影響，他們凝聚成一股共同的集體

記憶進而強化文化對內的共同性及對外的特殊性。

## 參考文獻

- 全秋菊，2005，〈《莊子》與中國荒誕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5(1):8-12。
- 李舫，2014，〈大時代的小個子〉。《國家人文歷史》18:80-81。
- 邱華棟，2015，〈博胡米爾·赫拉巴爾：帶淚的笑〉。《花城》6:203-206。
- 高翠君，2007，《論米蘭·昆德拉小說的遊戲精神》。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唐若冰，2008，〈在別處生活——從《無知》看米蘭昆德拉的流亡的終結〉。《和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127-128。
- 張美娟，2011，〈從尼采美學詮釋《人間詞話》李後主評論與「有我之境」意涵〉。《中山人文學報》31:147-173。
- 張洋，2014，〈從《愛情與垃圾》看布拉格精神〉。《世界文化》7:29-30。
- 喬華，2006，《伊凡·克里瑪的主客對立敘述模式及其解構策略》。東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論文。
- 羅望子，1998，〈多餘的話送給中魔的人〉。《讀書》2:91-93。
- 蔣承俊，1997，〈悼赫拉巴爾〉。《外國文學動態》4:33-35。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周國平譯，1996，《偶像的黃昏》。北京：光明日報。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余鴻榮譯，1992，《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台北：志文。

- Beatrice H. Nosco, 1967, "Books in Slavic languages" *Books Abroad*. 41(1) : 98-99
- B. R. Bradbrook, 1988, "Hebrew Literature in the 1990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2(3) : 656
- Kunes, Karen von, 1994, "World literature in Review"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8(4):848.
- Malynne Sternstein, 2008, "Review"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52(4) : 625-626
- Peter Petro, 1982, "Milan Kundera's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24(1) : 44-45

## 文學作品翻譯

- Bohumil Hrabal 著、楊樂雲譯，2002，《過於喧囂的孤獨》。臺北市：大塊文化出版。
- Bohumil Hrabal 著、劉星燦、勞白譯，2003，《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臺北市：大塊文化。
- Ivan Klima，景黎明、景凱旋譯，2002，《我快樂的早晨》。臺北市：時報文化。
- Ivan Klima，景黎明、景凱旋譯，2003，《布拉格精神》。臺北市：時報出版公司。
- Milan Kundera，黃有德譯，1992，《玩笑》。臺北市：皇冠出版社。
- Milan Kundera，尉遲秀譯，2004，《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臺北市：皇冠出版社。

(本文作者莊惠涵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曾獲得捷克政府獎學金，就讀於捷克查理大學；鄭得興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